讓戰爭遺跡說話：「和平導覽員」傳承的「沖繩戰」故事

撰　　文｜黃昱翔（琉球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圖片提供｜黃昱翔

最終司令部壕的摩文仁之丘，現為沖繩和平祈念公園的一部分，山丘上有各個都道府縣及戰後遺族團體所建之慰靈碑，照片為其中一景。

二戰末期，沖繩經歷美軍登陸作戰，平民被捲入戰爭，傷亡慘重；然而，作為戰爭遺跡觀光的故事腳本，戰後的沖繩戰記憶剛開始卻多以日軍為中心，缺乏民眾實際的戰爭經驗，沖繩於是發展出傳承民眾視角戰爭記憶的「和平導覽員」。本文認為，沖繩和平導覽員在引導聽眾參觀戰爭遺跡的過程中，透過貼近當時居民經驗一手證言，以及導覽員反思性的導覽實作，不但弭平了自身非親歷戰爭卻述說戰爭故事的當事人困境，更豐富了以負面遺產討論和平的可能性。

Towards the end of WWII, civilians were caught up in the fighting and suffered heavy casualties when US forces landed on Okinawa. However,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 story script of battle remains tourism was based the memories of the Battle of Okinawa that were centered on the Japanese Army, lacking actual civilian experience of the war; in response, Okinawa developed the Peace Guides who convey memories of the war from the viewpoint of civilian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eace Guides guiding visitors around the battle remains, through the first-hand testimony of residents who lived through the fighting and the reflective guidance practice of the guides, any doubts presented by their telling the story of war without actually having witnessed it themselves are dissipated.

對許多台灣人而言，沖繩可說是去日本旅遊的最佳選擇之一：便宜機票，7、80分鐘就能抵達，有景色優美的海灘，有EISA（沖繩太鼓）表演等異於日本的文化特色，又能得到買藥妝、吃拉麵等典型的日本旅遊體驗。然而，如果把時間倒回70多年前，沖繩不僅是日本境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極少數曾直接歷經美軍登陸作戰、造成平民傷亡慘重的地區，更在戰後日本恢復主權之後，繼續由美軍統治20年，這使得沖繩縣內無論是對戰爭遺跡的保存使用，以及戰爭記憶的傳承，都與日本本土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最廣為人知的負面遺產，莫過於1997年申遺成功的「廣島和平紀念碑（原爆圓頂館）」，作為見證全世界唯一原爆的負面遺產，「廣島原爆紀念碑」主要將原爆戰爭呈現為「全人類」都必須警惕的「絕對之惡」，然而根據Beazley（2010）的討論，在國際上，投下原子彈的美國嘗試阻擋日本申遺，而在日本國內，原爆犧牲者的故事則選擇性排除「非日本人」的受害者，所謂值得全世界反省、紀念其和平意義的負面遺產，也必然受國際跟地方政治影響。而在沖繩，負面遺產保存與記憶的政治性除了展現在日本與美國之間，也很大程度展現在戰後沖繩與日本的關係之中。

本文將以我2014-2015年於琉球大學交換留學一年期間的觀察，和二手資料為主，介紹傳承「沖繩戰」記憶的「和平導覽員」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現、又是如何用戰爭遺跡說故事。交換期間我曾修習校內具有和平導覽經驗的老師開授的「沖繩基地與戰跡I、II」課程，參加過也擔任過和平導覽；在資料部分，沖繩本地學者第一手的討論與保存紀錄資料量龐大，我主要引用直接討論「沖繩戰」遺跡保存及「和平導覽員」實作的研究。

如何製作「沖繩戰懶人包」？

「沖繩戰」指的是1945年戰爭末期美、日雙方軍隊在沖繩本島及鄰近諸島上發生的登陸作戰。美軍在3月26日登陸慶良間諸島，4月1日登陸沖繩本島，日軍將總部設在地勢較高的琉球王國時代政治中心—首里，但隨著美軍於5月底攻破首里，陸軍也將司令部往南遷移到本島最南邊的糸滿市摩文仁，一直到6月23日（一說22日）陸軍總司令官牛島滿自殺為止，算是戰爭名義上的結束。8月15日日本簽屬停戰協定開始由美國託管，並於1952年簽訂舊金山和約後恢復主權獨立，然而沖繩卻成為冷戰格局中的例外，因其軍事位置重要而持續由美軍統治，直至1972年才回歸日本。[1]

沖繩戰地圖[2]

以上看起來或許頗能客觀概述這場戰爭，但在今日的沖繩境內，無論報紙、新聞、書刊提到「沖繩戰」時，故事的畫面應該會是這樣的：

美軍真正登陸之前，沖繩其實已經逐步進入備戰狀態：軍方要求沖繩民眾協助挖掘防空壕，並動員各層級所有民眾備戰；軍方警告民眾萬一成為美軍俘虜，會被凌遲或強姦後殺害，導致戰爭初期居民拿手榴彈「為了天皇」集體自殺，軍方到底有沒有命令居民自殺至今仍是日本左右派史觀爭論的重點；6月下旬陸軍總司令官自殺，這場戰爭本該在此結束，但司令官卻留下一段話，要大家「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美軍透過移民夏威夷的沖繩裔廣播，要大家走出防

---

1 以軍事戰鬥經過為主的說明可參考如這篇。太平洋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概要沖縄戦。http://historyjapan.org/outline-battle-in-okinawa。取用日期：2018/4/11。

2 參考朝日新聞：沖縄戦とは何か？深く知るためのQ＆A。取自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J6K43QDJ6KUEHF008.html。取用日期：2018/1/8。

空洞投降，否則就炸毀防空洞、以火焰放射器焚燒，然而許多軍民共處於防空洞裡，直到1945年8月甚至日本官方宣佈投降之後的9月，「沖繩戰」仍尚未結束，原因除了居民自己對投降的不安與恐懼，更是日本兵不讓居民投降，甚至開槍射殺打算出去的民眾……。

一場戰爭打了8個月，平民每4人之中就有一人失去性命，民眾視角的戰爭經驗其重要性在今日已經確立，但「沖繩居民本位」而非「軍隊戰鬥過程本位」的說故事方式，是在怎樣的過程中被確立？又透過怎樣的實作來傳承？

「沖繩戰」遺跡調查與保存

全日本官方的戰爭遺跡調查與保存，主要是從1990年近代化遺產調查中納入「軍事建築」項目開始，1995年時又修改規定，將二戰時的遺跡納入指定紀念物（史跡）標準中，2005年則增設「登錄記念物」制度，讓未到指定等級的遺跡也有被納入的彈性。（清水、村上，2007：331）

針對「沖繩戰」，最大規模的遺跡調查也大抵跟著這個潮流，在1998-2006年間由沖繩縣埋葬文化中心執行，至2007年為止共確認了979件遺跡，其中有詳細歷史經過和現況說明者有254件。（清水、高橋，2009：837）

然而，「沖繩戰」遺跡相關的保存，當然不是從這些正式調查與政府認證都完成後才開始。吉浜忍（2008）的整理中詳細將「沖繩戰」的遺蹟保存分成幾個階段：首先主要在觀光資源開發動機的驅動下，在60年代就有少數保存的嘗試，其中一個案例是1962年那霸市打算開發首里的陸軍司令部壕作參觀使用，但因為已經找不到確切入口和內部崩塌危險而作罷；70年代開始強調戰爭遺跡的價值和保存活用的意義，1977年成立的「思考沖繩縣之會」開始呼籲保存，而特定學校開始進行類似今日和平教育的「戰跡巡禮」，進而影響了80年代組織性「和平導覽」的出現和發展。其中一個代表性的組織「沖繩和平網絡」（沖縄平和ネットワーク），在1995年以指定文化財為內容，要求縣政府及市町村政府對戰爭遺跡的保存與活用作出具體回應並持續監督。

沖繩的戰爭遺跡使用——從慰靈觀光到「和平導覽員」

從上述吉浜忍的整理可以看到，戰爭遺跡的保存與「和平導覽員」及其組織密切相關，然而這樣的實作當然並非一下子冒出來，而是為了抵抗「以日軍戰鬥過程為中心的記憶方式」，才由縣內學者和縣民一起逐漸發展出來的。

現在的姬百合之塔與當時的陸軍醫院壕遺跡。

戰後初期的日本其實並不了解沖繩經歷登陸作戰的實際慘況。沖繩之外的普遍民眾對於「沖繩戰」的第一次接觸，是來自石野徑一郎刊載於雜誌上的文章，以及1953年由今井正導演執導後大熱，有6百萬人次觀影的「姬百合之塔」[3]。（寺石，2013：192）

姬百合學徒隊是由第一高女和師範高女的學生及老師2百多人組成，任務在於協助軍醫治療、照顧受傷日本兵，從3月被徵招開始，女學生們隨著軍醫院和退守的陸軍幾次往更南邊遷移，直到6月司令官自殺後，女學生們只能各自逃難，有些人徬徨崩潰最終自殺，有些人則在逃難的過程中喪生。電影的熱潮號召日本觀眾的情感一舉提高姬百合學徒隊的知名度，以致很長一段時間，來自日本本土的觀光客只要到沖繩，都想造訪紀念學徒隊的姬百合之塔。

然而50-60年代當時，沖繩仍由美軍統治，從主權及邊境控管角度來看，與日本非同一個國家，觀光旅遊並不如現在方便，特別到沖繩走訪戰爭遺跡者，僅以死於「沖繩戰」的日本兵遺族為主。北村毅（2004）詳細考察了當時的狀況：從1954年來自北海道的戰歿日本兵遺族到沖繩建立第一個慰靈碑起，各都道府縣於60、70年代先後前往沖繩，大多於陸軍最終司令部所在地「摩文仁之丘」，建起自己縣戰歿士兵的慰靈碑，而其中多數慰靈相關敘事都在歌頌日軍為國捐軀，被當時的沖繩研究者稱為「沖繩戰跡的靖國化」。（2004：61）

---

3 日文中「塔」一詞有「悼念亡者並為之祈福的紀念碑」之意，詳コトバンクhttps://kotobank.jp/word/%E5%A1%94-103026。取自2018/03/20。

針對這些來自日本的遺族和觀光客，旅遊巴士公司所提供的套裝戰爭遺跡觀光行程，走的就是姬百合之塔及摩文仁之丘所在的「南部戰爭遺跡觀光路線」，旅遊巴士公司使用寫好的誇大腳本，並訓練遊覽車上的導遊，盡可能將戰爭的過程說得戲劇化，比如將牛島滿司令官與長勇副官的自殺說成「在月亮即將沒入南海之際，兩軍官一起學習古代武士英勇切腹」（2004：64）。

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後不久舉辦的「歷史教育者協議會沖繩大會」上，來自全國的參與者親身參加這些巴士導覽團，主要會員也是負責沖繩戰口述史編撰的安仁屋政昭批評遊覽車導遊的說詞多所偏頗：「將沖繩戰當成保衛祖國之戰、把縣民的犧牲說成殉國佳話、都是以軍人爲中心」，並開發了新的路線，成為當今和平導覽設計實地訪查路線的開端，他們也認為問題在於原先的戰爭遺跡觀光路線，其「參訪地點本來就不好」，許多地面上的建築物未被保存已經消失，而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則是埋在地底下，較可能尚未被破壞的天然洞穴「Gama」（ガマ）。（北村2004：66）

1 | 2

1. 姬百合之塔與摩文仁之丘都位於沖繩本島最南部，是戰爭末期戰鬥最激烈、死傷最嚴重之地，也是60年代南部戰爭遺跡觀光的主要路線。
2. 牛島滿司令官自殺的摩文仁司令部壕。

所謂Gama，指的是沖繩石灰岩地形形成的天然鐘乳石洞，在戰爭期間無論軍民都曾藏身其中，將之作為防空洞使用。前述之戰爭遺跡調查提到，由於沖繩大多數的地上建造物都已經被炸毀，防空壕約佔調查結果的81%。（清水、村上，2007：312）。在被稱為「鐵之暴風」的「沖繩戰」期間，炸彈的碎片隨時隨地可能從四面八方飛來，親歷戰爭的沖繩人以「唯一沒有鐵片飛來的方向，就是腳底下」來形容當時的情況，而第一次進到防空洞的親歷戰爭者則曾說「Gama裡像天堂一樣」，「Gama」和沖繩海岸線並列為唯二「與戰爭當時的景貌幾乎相同」的戰爭遺跡。因此，當80年代和平導覽活動開始，走訪並進入到「Gama」的內部以體驗戰爭當時日軍的使用情況以及民眾避難的環境，逐漸取代了原先的戰爭遺跡觀光路線，成為當代和平導覽中重要的一環。

沖繩和平導覽的特色與策略

那這群沖繩的「和平導覽員」到底是誰？具體而言如何導覽戰爭遺跡？

「和平導覽員」一般被定義為「在戰爭遺跡、軍事基地，和平資料館及博物館，針對來訪者作介紹的人。」（琉球新報社，2003；轉引自杉田宏明，2006：35）而沖繩主要團體的「沖繩和平網絡」，則將其組織裡的導覽員定義為「與為了和平學習來訪沖繩的人，或縣內的小學、國高中生一起走訪戰跡或美軍基地，傳達戰爭的實際情況和沖繩的現況，並共同思考什麼是和平」的人。在此所謂「共同思考和平」，是指導覽員必須在方法論上有意識地調整，在清楚認知彼此擁有的知識不對等的情況下，依然建立「讓學習者作為主體的對等性及雙向性」。（杉田宏明，2011：178）

早期日本的和平教育是透過「證言」的分享，也就是藉由親歷戰爭者敘述自己的戰爭經歷，來讓戰後世代理解戰爭。然而，隨著距離戰爭的時間愈來愈遠，親歷戰爭而能親自分享經驗的人愈來愈少，「證言」必須要傳承給下個世代才能夠延續。在沖繩，最開始是由經歷戰爭世代的學者較有規模的整理出戰爭的「證言」，收錄於「沖繩縣史沖繩戰紀錄」當中；如前面提到的姬百合學徒隊，由當時活下來的成員組成並分享戰爭當時經驗的組織（語り部）也與下個世代交流。現今沖繩的和平導覽員來源有以下幾種：有許多是從大學時期藉由和平學或沖繩戰歷史的課程，以及相關社團接觸並擔任。此外也有擁有戰爭遺跡的各市町村自己培養的導覽志工、各地地方上的志工、或特別有志於此的年輕巴士導遊，以及計程車司機等小型組織等。（杉田，2006：35-39）

80年代開始，因為公立學校搭飛機修學旅行[4]的禁令解除，有愈來愈多高中選擇帶學生去沖繩修學旅行，2003-2007年沖繩甚至曾經成為國內最主要的修

學旅行目的地（藤原，2013：161），目前「沖繩戰」和平導覽的主要對象，就是來自日本本土的高中生，以及對沖繩的戰爭歷史有興趣的成年人旅遊團。

現今的「和平導覽員」大多數並非親歷戰爭者，必須使用他們聽過的證言分享、被記錄下來的口述史、以及其他各種歷史資料來理解當時的情況，並組合出導覽的內容，依據其導覽的對象性質對內容作部分調整。

在此，導覽員使用的策略之一，是盡可能不將客觀的數字和資料當作導覽重點，反而主要利用親歷戰爭者的「證言」，配合戰爭遺跡現場可以直接觀察體驗到的狀況，讓聽眾更容易進入故事。如果行程安排許可，可能也會選擇一位親歷戰爭者的證言，依其當時的逃難路線來安排導覽路線。

安里要江的證言與逃亡路線圖，課程當中老師以此作為上課講義，並帶領我們實地走訪當時要江逃亡路線的地點。翻拍自朝日新聞社出版之〈沖繩戰特集〉。[5]

4 「修学旅行」一般指國小、國中、高中由，通常會辦在最後一學年，也就相當於我們在台灣的畢業旅行，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意義。但也有學校辦在第一或二學年，因而此處保留修學旅行這個說法。

5 知る沖縄戦。朝日新聞社，2015。

我在琉球大學交換留學期間，曾選修「沖繩的基地與戰跡II」課程，課程講師有多年擔任「和平導覽員」的經驗，我們利用暑假的一整個星期，由老師以平常帶導覽的方式，帶學生走訪沖繩各地的戰爭遺跡和美軍基地周邊。而其中一天的行程，就是以下圖這位「安里要江」的故事，來串連我們走訪的南部戰爭遺跡。

戰爭當時的要江是一位年輕的母親，於6月中旬與家人逃難到本島最南邊的糸滿市，並躲進軍民混居的Gama「轟壕」避難，直到成為美軍俘虜進入收容所為止。要江曾經因為8個月大的女兒飢餓哭鬧而被士兵拿槍指著女兒威脅，而女兒最終仍不敵飢餓死於防空壕內：「我一直抱著她，逐漸發現她的身體愈來愈冷。我最後悔的，是當時連一盞燈都沒有，我沒能見到她的遺容。但我一邊摸著她的臉和皮包骨的身體，心想我用手指代替眼睛永遠記得這個觸感。」（朝日新聞社，2015：9）。

老師與我們一起親身爬進轟壕後，就在當時居民藏身的大略位置，告訴我們要江的故事，身為聽者的我們可以直接用感官感受防空壕裡的陰暗與潮濕、關掉手電筒就能馬上體會要江避難當時，沒有任何燈光可以看自己女兒最後一眼的狀況。但同時，老師也指出當時日本士兵的位置，並另外引用當時藏身於此的日本兵證言，來說明士兵當時的極限情況。在此，一個故事裡受害者——加害者圖像的兩端都還原為血有肉的真實人物，而非資料上扁平的「受害沖繩居民」、「加害日本兵」，聽者或許會直覺知道日本兵之殘酷，也能反思如果自己身在當下作為日本兵，未必不會做出類似的行為。

轟壕一景。筆者曾經擔任過一次修學旅行高中生的導覽，照片為2016年1月拍攝。

日本兵拿槍指向哭鬧小孩威脅其母親，甚至射殺小孩的故事，在「沖繩戰」相關的戰爭記憶裡很常被提及，沖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中也有一個模型重現這個景象。「和平導覽員」不只說出這個「故事」，還要想辦法將故事連結到遺跡現場的景物。藉由實地走訪和的身歷其境感，先用一個有名有姓的親歷戰爭者類似經歷，再擴及普遍經驗。藉此達成「和平導覽員」過程中期待的「對等性、雙向性」。

然而，這種以親歷戰爭者的「證言」，而非客觀資料作為導覽主軸的方式，並不代表「和平導覽員」是在還原、複述或盡可能逼近她們的戰爭經驗，「和平導覽員」既不可能為親歷戰爭者代言，也不會以此為目標，相反地，他們其實必須透過自己對於「沖繩戰」的理解，配合來訪的學校和團體的需求和期待，「和平導覽員」自身其實就負擔了規畫、諮詢、交涉、蒐集與製作資料、導覽、教育等工作（杉田，2006：

39-40）。屋嘉比（2009：iv-v）認為，傳承沖繩戰的戰後世代除了必須自覺自己並非親歷戰爭者外，還必須與親歷戰爭者的共事（共同作業），藉此與戰爭經驗真正產生連結。戰後世代本身同時是「傳承者」也是「聽眾」，雖然並非「經歷戰爭的當事人」，卻可以作為「與戰爭經驗有關的當事人」來傳承經驗。在此導覽員的另一個策略，是向聽眾/學習者揭露導覽員「自身」與「沖繩戰」的關聯。

北村毅（2007）的研究中介紹了導覽員野口正俊的作法：他1936年出生於香川縣，直到2004年才搬到日本，接受培訓並開始擔任導覽員。野口並不是沖繩人，但他的父親卻是作為日本兵死於這場戰爭：「我的父親被推測死於眞壁這個地方。在這裡父親與這些居民產生了連結。當時的日本兵做了什麼呢……比如在Gama裡，軍隊說自己要用就把居民趕出去。……在Gama裡也發生過虐殺居民的事件。此外也有日軍強取民眾的糧食、只因爲居民說了沖繩方言，就將他們當作間諜殺害。這些是來自軍方的命令。這些事在戰爭最末期的眞壁想必也發生過吧，說不定我的父親就是其中一人。」（轉引自2007：62）。野口雖然是用類似懶人包的方式列舉「日本兵虐殺居民」的故事，父親也未必就是那些故事的主角之一，但透過揭露自己父親與「沖繩戰」的連結，他一樣能讓故事人物有血有肉，同時父親可能是加害者與野口作為「和平」導覽員身分的矛盾，也讓他所處的位置不再只是「安全」的戰爭批判者，聽眾意識這樣的矛盾，比較不會因為資訊有限而輕易簡化故事。

村上登司文等（2016）的研究中，一位受訪的導覽員K，則認為「和平導覽員」的角色在於「繫（つなぐ）」，連結人跟戰爭、人跟親歷戰爭者、人跟人，以及人跟社會：「以前我（在說明的時候）常說，這裡發生了這樣那樣的事，也就是說出所謂的事實，然後才說，接下來是我個人的意見，比較常用這種方式講述。（現在）我則很常談我自身的體驗。我自己跟沖繩戰是怎麼相遇的，當中有令人喜悅的事，也有令人大受打擊的事等等……」（轉引自村上等，2016：115）

具體來說，導覽員會直接跟聽眾分享自己成為導覽員的理由、跟新的導覽對象分享以前導覽時遭遇過比較難回答的問題、與親歷沖繩戰的長輩如何相遇、被交付了怎樣傳承記憶的期待等等。

Bourdieu在談反思社會學時，曾說「他們表面上用科學語言談及的並非對象，而是他們與對象的關係。」（2009：117），研究者本身也身處在一些特定的學術場域之中，比起以往實證科學要求研究者超然地客觀化它的對象，觀察自身在學術社群的位置並在研究脈絡中將它呈現出來，才會讓研究更加具有科學意義。

「和平導覽員」的實作固然未必完全符合此處反思性。但就其基本定義以及導覽的實作來看，和平導覽要求導覽員清楚意識到自身如何利用「沖繩戰」的所學所感來編排、重述戰爭記憶，而不只是擔任戰爭經驗的忠實傳遞者或覆誦和平教條的人，導覽員客觀選定並敘述的沖繩戰故事很可能就是「它與沖繩戰的關聯」，而非歷史事實本身。為何自己會對不是親身經歷的這場戰爭產生興趣到願意成為導覽員？自己如何在相關的知識生產過程中（沖繩戰後的歷史脈絡如何促成這些知識的累積、導覽者在怎樣的社群之中接受訓練，並成為一個導覽者）獲得了這些知識？這些也都被認為應該在方法論的層次上討論，並納入一場導覽的安排中。

當聽眾得以知道導覽員本身是站在什麼位置、以什麼樣的過程敘說這些故事，聽眾的思考才不會與導覽員之間的「歷史知識」不對等，而落入全信／全反的兩極，也能夠開啟不同於親歷戰爭者以感性邀請聽眾同理的形式，讓聽眾意識到自身的位置，重新提問所謂和平為何。

結語

上文中長期調查沖繩戰遺跡的吉浜忍（2008：55）曾在文末說：「戰爭遺跡是『物』。物不會說話。要讓物說話需要人的介入。」在此他指的是戰爭相關資料和親歷戰爭者的證言需要人做採集才能累積。

以當代沖繩而言，和平導覽員或許可說是傳承沖繩戰記憶，「讓物說話」最重要的實作者。藉由對沖繩戰歷史的學習理解與重新編排，有意識地在說故事的方法上並呈現自身與沖繩戰之關聯，沖繩的「和平導覽員」正在有效讓戰爭遺跡說話。然而也值得注意的是，導覽員之所以能「使用」戰爭遺跡來說故事，既與戰後遺跡保存的歷史過程密切相關，要讓並非自己親身經歷的證言更能具象化，也必須以遺跡至少可以被確認、被一定程度保存為前提。可說當今沖繩的導覽實作與戰爭遺跡是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

沖繩的「和平導覽員」以連結「遺跡與人」、「人與人」的導覽方式，及導覽員本身反思性的導覽實作，來回應戰後沖繩與美國、日本間戰爭記憶的政治，及因之而生的戰爭遺產觀光消費，也開啟讓戰爭遺產來說故事並帶動討論和平的新視野。

參考文獻

- 李猛、李康（譯），2009。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原作者：Pierre Bourdieu＆Loïc Wacquant）。臺北市：麥田出版社。（原作：1992年）
- Olwen Beazley, 2010. The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Genbaku Dome) as World Heritage. In (Eds). Labadi, S. and Long, C. Heritage and Globalization, pp. 45-65. London: Routledge.
- 沖縄平和ネットワーク，1997／2008。新歩く・見る・考える沖縄。那覇：沖縄時事出版。
- 沖縄県平和記念資料館，2007。沖縄の戦争遺跡。那覇：沖縄時事出版。
- 屋嘉比収，2009。沖縄戦、米軍占領史を学びなおす　記憶をいかに継承するか。横浜：世織書房。
- 成田龍一，2015。現代社会の中の戦争像と戦後像。成田龍一、吉田裕等，記憶と認識の中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頁：163-186。東京：岩波書店。
- 里井洋一，2018。社会科教育と沖縄の平和教育史。星野英一等，沖縄平和論のアジェンダ　怒りを力にする視座と方法，第７章，頁：163-186。京都：法律文化社。
- 杉田明宏，2011。コラム10平和ガイドのチャレンジ：「平和教育」への問い。竹 久編，平和教育を問い直す　次世代への批判的継承。頁：178，京都：法律文化社。
- 朝日新聞社，2015。特集　知る沖縄戦。
- 清水 肇、村上有慶，2007。戦争遺跡詳細調査と近代化遺産総合調査にみる沖縄県の戦争遺跡の把握状況。日本建築学会技術報告集，13（25）：309-312。
- 清水 肇、高橋 弘治，2009。歴史的環境における「負の遺産」のあり方について　沖縄の戦争遺跡の実態と可能性を通じた検討。都市計画論文集，44（3）：835-840。
- 清水 肇、高橋 弘治，2012，沖縄県内の戦争遺跡の残存状況。日本建築学会技術報告集，第18巻第38号，頁：331-334。
- 北村毅，2004，沖縄戦跡の〈表通り〉と〈裏通り〉：〈沖縄戦記録／継承運動〉の源流。ヒューマンサイエンスリサーチ 13，頁：51-72。
- 北村毅，2006，〈戦争〉と〈平和〉の語られ方：〈平和ガイド〉による沖縄戦の語りを事例として。人間科学研究，19（2），頁：55-73。
- 北村毅，2007，沖縄の〈摩文仁の丘〉にみる戦死者表象のポリティクス――刻銘碑〈平和の礎〉を巡る言説と実践の分析――。地域研究 3，頁：49-66。
- 杉田明宏，2006，沖縄・平和ガイドの平和心理学的考察。心理科学26巻（2006）2号，頁：30-47。
- 寺石悦章，2013，沖縄の戦跡観光：慰霊から平和学習へ。宗教と社会19（0），頁：191-193。

・藤原幸男，2013，沖縄と平和学習修学旅行。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実践総合センター紀要no.20，頁：159-168。
・村上登司文，井上力省，長岡文音，増田友紀，2016，沖縄の平和教育－平和教育の現代化への課題－。京都教育大学教育実践研究紀要，第16号，頁：107-116。
・吉浜忍，2008，沖縄県における戦争遺跡の保存活用：戦争遺跡の文化財指定を視点に。沖縄国際大学社会文化研究11（1），頁：43-71。
・里井洋一，2018。社会科教育と沖縄の平和教育史。星野英一等，沖縄平和論のアジェンダ　怒りを力にする視座と方法。第７章，頁：163-186。京都：法律文化社。
・屋嘉比収，2009。沖縄戦、米軍占領史を学びなおす　記憶をいかに継承するか。神奈川：世織書房。
・成田龍一，2015。現代社会の中の戦争像と戦後像。成田龍一、吉田裕など。記憶と認識の中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頁：163-186。東京：岩波書店。